

庞飞：当代水墨的上海样本

范昕

热络，直率，真性情，海上画家群体中，庞飞是独特的存在。不单单其人，也包括他的画。他贡献了当代水墨来自上海的一个独特样本。

从2011年跻身文汇报“上海文化新人榜”，2014年入围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中的“上海青年艺术家培养计划”，一路走来，今年50岁的庞飞，不会再被归入“新人”行列。继两年前先后在苏州博物馆和北京画院举办大型个展之后，他正在筹备将于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举办的个展，想让更多的人感受新海派艺术的活力，也想带着从几个大展中汲取的得失与能量，继续前行。

传统与当代，相融共生

主攻山水，游刃有余地行走于传统与当代之间，庞飞以酣畅淋漓的泼墨泼彩形成自己成熟的画风。很难定义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画，无论艺术评论家李小山用以形容它们的“耐看和深度”，还

是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提示其意境时所用的“玄秘与幽深”，无不指向一种耐人咀嚼的丰富性。南与北，灵秀与苍茫，自然与文人，传统与当代，古意与国际、感受与笔墨，实景与虚境，精深与广博……这些看似对立的名词，在庞飞的画中都浑然天成，日益显出一种圆融的面貌。

这种特性或与艺术家的个人轨迹不无关联。庞飞的家乡在陕南紫阳，南临四川，北依秦岭，当属南北交会之地。从大巴山麓走来，辗转厦门、广州、深圳、杭州等地，他从乡村教育的驻村督导到投身特区教育，再至冲到杭州西湖边的中国美术学院进修，最终落到上海，成为了“新上海人”。

大巴山里长大，画山水，再自然不过。难怪庞飞常常笑言：“身为山水画家的最大优势，在于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大巴山里来的西安画家特别多，热情满满地给他们带路，充满好奇地看他们写生，年复一年，庞飞的山水画启蒙就是这样在长安画派的滋养下完成的。

日后，又因人生路之转向，而叠加上浙派、海派等诸家影响。

从相对传统的积墨转向带着抽象意味的泼墨，令庞飞完成迄今艺术创作历程中最大的一次风格转变。这种转变的形成，在他定居上海不久。庞飞笑言，开放性、国际化是上海重要的文化底色，“在这里从事艺术创作，不创新，不研究当代，是对这一方水土的辜负！”他还记得探索初期，有位资深画家在看过他的一批作品之后说：“你的积墨山水已经画得挺好了，但全中国每个县城几乎都能找到擅长这种画法的画家，倒是你的泼墨，虽不成熟，我却是第一次见。”这话给了庞飞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坚定了从传统国画向当代水墨的创作道路，进而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辨识度。

这样的画，远看，如同一幅抽象画，看山不是山，走近，仿佛身在此山中，似能感觉到山中的风云骤变，水汽氤氲。庞飞以大面积泼墨形成忽重忽轻的墨色变化，以烘托气氛，表现出云雾绕青山的虚实相生之景。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评价，庞飞画中空灵感、尘埃感，正是对水的润泽、墨的尺度有相当把握之后才达到的境界。其中，泼墨揉纸构成一种引人关注的特殊技法，既可上溯至“败壁张素”的传统渊源，也有当代艺术中的“偶发”因素。无数的抽象叠加，呈现出意味深长的“熟悉的陌生感”。

近年来，庞飞又为笔下的山水敷上斑斓的色泽，在泼彩上越走越远。这一系列作品渲染更加自由，宛如一幕幕梦里天堂，人间仙境。其泼彩用色不同于张大千的妍丽或是刘海粟的野性，有意对色彩进行降调，甚至将墨色相融，以此

去除青绿的艳丽和烟火气，追求色墨一体的浑然效果。

有意思的是，庞飞的山水画中，又分明可见两座真实的大山——巴山与太行山。作为记忆深处魂牵梦萦之处，巴山是庞飞山水画创作的出发点。它的奇险，它的神秘传奇色彩，它印了“巴山夜雨”的氤氲感，无不滋养着庞飞的创作。太行山则更具北方大山的雄浑气魄，其特殊的山石质感和辉煌的革命历史，承载了庞飞锐意进取的艺术自觉，为其创作提供了形式和意义上的双重灵感。甚至，当今的现代景观循着庞飞的山水画也有迹可循。那通常是盘山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在某个不起眼的位置若隐若现，如彩蛋一般入画。

在尚辉看来，庞飞的山水画，既不是用水墨直接呈现视觉所见的写生性山水，也不是完全脱离对象纯以传统笔墨表现审美经验的笔墨性山水，而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切入点。即，在表现现实性的山水上，不是照抄自然，甚至也不是从写生画稿转变而来，而是注重感受真实性的表达。从中能够看到这一代人对于意象观照自然与表现主观心性这一中国画文化精神的理解与把握。

以笔绘真心，再度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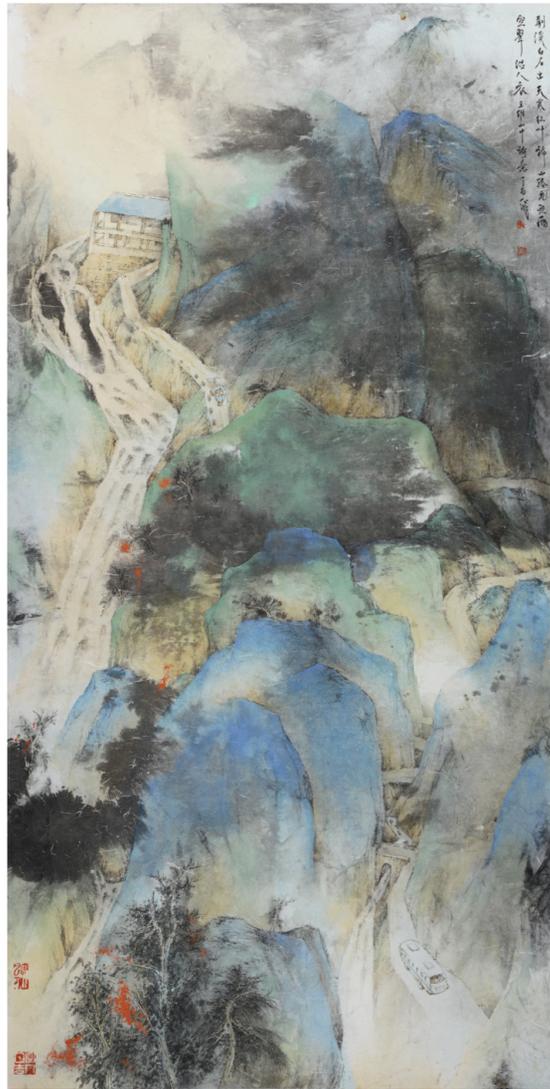
正当庞飞凭借面貌日趋成熟、风格逐渐稳定的泼墨泼彩山水，赢得一定的学术地位，作品近年亮相西岸艺博会等大型展会，亦备受中外藏家青睐，他其实在暗自“憋大招”。

最近一两年，庞飞把能推的应酬全推了。他将更多的心思，一方面放在了外出写生这件事上，另一方面则用于揣摩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精神，尤其是一种“拙”的境界。

春天随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同事们赴敦煌写生采风，庞飞带了一系列写生小品，面貌迥然不同于他为人熟知的山水画。这是颇见松弛感的写意水墨，用阔笔淡彩绘眼前即景：千佛洞的菩萨，丹霞地貌，鸣沙山的骆驼，莫高窟前排队入场的游客……画面删繁就简，甚至聚焦局部，加以抽象，刻意挖掘事物背后的趣味，有时似写意漫画。

“保持泼墨泼彩山水水准的同时，我一直在寻找新的感觉。”庞飞说。而到各地写生，正是他所认为的一种有效途径。脚踏大地，问生活要灵感，走到哪，总能收获到活泼泼的系列创作。庞飞写生，随身往往就带一支小勾线笔，大面积的渲染便碟、碗、墨甚至雨一起上。同行者说他是泼墨派，他则笑称自己是“怎样都行”派。

中国古代画家早已深谙写生之道。荆浩见太行松，在《笔记法》中写道：“因惊其异，遍而赏之。明日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方如其真。”黄公望则在《写山水诀》记述：“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从“数万本”到“发生之意”，庞飞认为便是脱胎换骨。他坦言，写生，在于人与物象两相遇的感觉。朱光潜说到的所谓“静趣”，自己尤其推崇，



▲庞飞《王维《山行诗意》》



庞飞以酣畅淋漓的泼墨泼彩形成自己成熟的画风。左图是他的《多少楼台烟雨》，右图是他的《山外山》。



那是陶渊明所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所写的“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重要的是自然天成画“自己”。

一头扎进中国传统绘画的宝山，庞飞在追求当代的路上越走越远时，愈发坚定。尤其令他“上头”的，是中国传统水墨中的写意精神。从关良到齐白石，从扬州八怪到梁楷、牧溪，庞飞毫不讳言对于这些画家的钟爱。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擅长写意的“减笔”画，带有某种共通的特质，那是一种“拙”，有别于很多绘画名家的“巧”。其间蕴含着历经千帆之后的洗练，或许恰如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

偷师传统，上不上手很关键。徐汇滨江的画室里，堆满了庞飞从域外“淘”来的小幅古代文人画——眼下正是域外水墨回流的窗口期。它们大多距今有些许年岁，题材庞杂，绘者之名或已不可得知，画面以逸笔草草形成的盎然趣味，让

人过目难忘。庞飞将其中的不少装裱成了一本可以随手翻的册子，俨然“武功秘籍”，随时观摩研究。这些小画，不是出自中国古代，就是在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从真迹中，更能触摸到传统水墨的温度。我眼前仿佛打开一个新世界。”庞飞说。

勤力写生与研习传统，看似是两回事，它们却又在同一股追求中汇流了：艺术是真情的怒放，也是生命的真迹。

“五十知天命。到了做个阶段性小结，然后再出发的时候。”庞飞说。有一点，他十分笃定，深入传统探寻宝藏的立足点永远是当代，“我想将传统精华转换为当代观照，赋予传统生命。这才是一种血脉的传承。”

我们并不知道，他的这些新探索最终会形成怎样的新思考，又为其艺术创作做出怎样的新路，我们却不禁报以深深的期待。

艺·见

并置展示的文物与当代艺术，带来哪些思考

于奇赫

湖南省博物院举办的历时四个半月的展览“神游——历史时空中的数字艺术”，将人们所熟知的商代人面纹方鼎、T形帛画等院内重要馆藏，与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作品一同展示，让考古与艺术、历史和现实产生了视觉上的共振。展览中出现了曾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大型个展的艺术家梁绍基的影像作品《平面隧道》，其创作灵感来自湖南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

梁绍基作品以及素纱单衣复制品被放置在一起，观众可以直观地看到纤细的蚕丝贯穿了中国漫长的历史，蚕的生命始终与人类的智慧交织在一起，或许这种特殊的生物材质真的形成了一条隐秘的时光隧道。而此次展览的特点即在于此，将虚与实、存在与想象融合在一起，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的“头脑风暴”。

湖南博物院官方微博账号在展览开幕当天傍晚，发布了一条消息：“新展开幕！湘博带您领略历史时空中的数字艺术”。笔者注意到有评论称“有意思”，也有人表示“不知所措”。而这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反映出部分观众对于文物与当代艺术并置展示的困惑。

湖南省博物院是一座大型历史艺术类博物馆，这类博物馆对展示在世艺术家作品通常十分慎重。例如在2009年，年近50岁的严培明成为首位在法国卢浮宫举办个展的在世艺术家。而

展览“神游”中的参展艺术家王苒沫出生于1996年，2021年才取得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学位，的确不同于以往的惯例。

正因为历史艺术类博物馆拥有价值判断的话语权，所以进入其场域的艺术家也意味着获得了来自权威的肯定。例如法国奥赛博物馆的前身之一是1818年成立的卢森堡博物馆，卢森堡博物馆规定只有在艺术家去世十年后，他们被公众认可的作品才会进入卢浮宫，而不被认可的作品将会被捐赠给政府或其他机构。

展览“神游”是一场跨学科、跨媒介的展览，其挑战性与实验性与十月革命后苏联博物馆界萌发出的新思潮十分相似。那时候前卫艺术的领袖马列维奇与亚历山大·罗德琴科就认为博物馆应该是在在世艺术家的实验室，专注于未来。

回顾中国博物馆举办的文物与当代艺术并置类展览，可以追溯到1996年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当时，法国艺术家让·皮埃尔·雷诺的巨型雕塑作品《金盆》在大和门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展示。这件作品曾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等地展出，其简洁的现代花盆造型与明清故宫建筑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个观众都可以对这件作品进行不同角度的解读。

2013年底，南京博物院重新开放，其二期改扩建工程竣工扩大了博物馆的

展示空间。2015年5月，南京博物院举办展览“呼吸——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形塑”，展出了29位中国艺术家创作的59件雕塑作品。虽然此次展览中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属于当代艺术，但这场展览无疑是当代艺术大规模地出现在大型综合类博物馆当中，且其中的一些雕塑作品至今仍放置在博物馆的公共空间。

2018年，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推出“女神的装备——当代艺术@博物馆”系列艺术项目，展出了100余件藏品文物与30余件组当代艺术作品。该展览由机构策展人许笑潇与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独立策展人宋振照策划，从现实中复杂、多元的女性问题出发，以先锋性的姿态将文物与当代艺术在馆内空间并置展示，是一次对于中国博物馆叙事传统的革新与策划理念的颠覆。

“女神的装备——当代艺术@博物馆”系列艺术项目的出现，也恰好与博物馆的使命契合。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的使命在其官网中被表述为“通过历史文物和当代艺术的精品收藏和陈列、工艺美术和非遗传人的活态展示和传承、丰富新颖的公共参与活动，成为运河文化遗产、杭州城市文明鲜活的记忆读本，为城市生活的构建传统融合现代的文化自觉。”而杭州作为中国美术学院所在地，艺术家的创作也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该项目让博物馆关注现实事件、关注城市变化，以及

关注了人的生存状态。

在2019年之后，物与当代艺术并置展览在博物馆中增多，如四川博物院展览“物·色——明代女子的生活艺术展”、苏州博物馆展览“画屏：传统与未来”、山西博物院展览“玉见你——周代与当代关于玉的对话”、云南省博物馆展览“摩梭MOSO：家庭、婚姻、对话”、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展览“永远有多远”、洛阳博物馆展览“上洛”、故宫博物院展览“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杭州博物馆“净因——第四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特别项目”等，反映出中国社会思想的多元与活跃。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穆社潼认为，博物馆需要设计一套新的阐释系统来弥合物与当代艺术品之间产生的某种冲突，而在这种新的表达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策展模式也得到了创新；但是更为棘手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即如何找到一种观众能够理解的、更加合理的方式来建立观众、文物与当代艺术品之间的联系。正如湖南省博物院官方微博账号下的留言，有的观众并不认同博物馆将两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在一起展示的做法。

博物馆如何选择当代艺术品进行展示，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将其与文物并置并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本身的合理性与话语体系背后的主观性必定会引起争议。从历史上来看，

像埃尔·格列柯、文森特·梵高与克劳德·莫奈等艺术家都是在世时作品引发争议，其价值都是在很久之后才被发掘并肯定。而博物馆不论如何选择文物与当代艺术作品构成“对话”的关系，都将引发观众发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

但是，这种针锋相对的争议反而能体现博物馆的公共性，即博物馆是观众讨论、对话的场所。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面临挑战、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的当下，博物馆不能成为“一言堂”，应该将开放、包容与思辨的意识传递给每一位观众。作为展览“上洛”的联合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开放博物馆”的发起人，上海大学教授徐坚曾表示，开放性是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方向，博物馆应该赋予社会公众更多的权力，不仅仅是物质性和实务性的开放，更是精神性和知识性的开放。

当代艺术作为拆卸博物馆知识性围墙的一种手段，表明博物馆将主导权部分让渡给了艺术家，这是一种经过协商后的开放。而艺术家再将主导权还给了社会公众，因此，只要是博物馆遵循一定的原则，选取当代艺术与文物共同建构积极的意义，就应该给予支持。

此外，博物馆收藏的部分出土文物，反映出那个时代最高的技术水平，会让观众产生一种难以超越的“无力感”。但是，任何古代文明的出土文物，不论其在制造技术上多么精美，在技术

与功能上都与当今高科技产品相差甚远。因此，展览中与文物并置的当代艺术起到了一种提示的作用，让人们意识到不能因循守旧，只有开辟一条新路才能取得人类智识的突破。展览“照见天地心”展出105件故宫文物之外，还出现了艺术家徐冰用地书符号翻译的《兰亭集序》，其展示的意图正是凸显一种独特的创造力。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之源，是社会变革的重要，人的价值因创新得以彰显，博物馆同样也应该鼓励创新。

英国政府自上世纪末开始推动博物馆教育，“相信教育是当今博物馆的核心角色”；中国博物馆也认为教育是当代博物馆的首要目标，因此近年来公共教育活动、研学旅行与馆校合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从美育的角度来说，与文物一同展示的当代艺术会引发青少年和儿童的好奇心，并且可以在博物馆教育者的引导下激发想象力：“既然艺术家可以通过文物获得创作灵感，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呢？”博物馆教育者需要告诉青少年和儿童艺术家是如何看待文物、如何进行思考，以及他们用了哪些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与文物一同展示的当代艺术，也极大地提升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作者为东南大学区域视觉文化方向博士研究生）